

我国对拉丁美洲历史的研究

杨典求

拉丁美洲历史是我国史学领域中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讲授拉丁美洲史课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先后成立起有关的研究机构，为这一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初步基础。近几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随着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历史科学工作者日益重视并努力加强这一学科的建设。1979年12月成立了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随后出版了会刊《拉美史研究通讯》。目前，我国拉美史主要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史研究室、拉丁美洲研究所政治与历史研究室、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武汉师范学院巴西史研究室等。全国专门从事或兼顾这一学科研究工作的约有一百余人。拉美史的研究工作正在逐步开展，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

著述与译作

目前我国学者编纂的拉美通史著作只有李春辉教授的《拉丁美洲国家史稿》（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它是在六十年代初著者讲授拉美史课的讲稿基础上形成的。近两年著者又将此书增补修订，书名改为《拉丁美洲史稿》，篇幅由五十六万字扩充到七十万字左右，预计1982年出版。这部著作史料丰富，论述精当，结构严谨，自成体系，是我国史学界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拉丁美洲通史的尝试。撰写拉美国别史的工作也开始提上日程。武汉师范学院巴西史研究室编写的《巴西史》已完成书稿，准备出版。

国外拉美史著作的翻译以1956年冯明方译的福斯特所著《美洲政治史纲》开其端，迄今出版的译作约二十余种，较重要的有（美）艾·巴·托马斯著《拉丁美洲史》（寿进文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美）派克斯著《墨西哥史》（瞿菊农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苏）阿尔彼罗维奇等主编《墨西哥近代现代史纲》（刘立勋译，三联书店1974年版），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巴西史纲》（辽宁大学外语

系译）和（巴西）若泽·马利亚·贝洛著《巴西近代史》（辽宁大学外语系译，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美）菲·方纳著《古巴史和古巴与美国的关系》（涂光楠、胡毓鼎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苏）米罗舍夫斯基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金乃学译，三联书店1960年版），（美）鲍勃·简·扬著《拉丁美洲的解放者》（黄土康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苏）列符年科夫著《现代拉丁美洲国家》（启仁译，三联书店1961年出版）等。译者们的辛勤劳动，对于传播国外拉美史学，配合我国拉美史的研究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专题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拉美史的专题研究日趋活跃，报刊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尚屈指可数，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显著增加。1980年发表的重要论文近三十篇，数量和质量均比往年有较大提高。1981年又发表了十余篇研究文章。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专题研究的重点是探讨拉美近代现代史的一些重要课题，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拉美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拉美国家的自由主义改革，现代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及其重要思潮，当代拉美国家的社会性质，拉美与美国的历史关系，拉美与中国的历史关系，拉美的史学发展及其流派，以及对拉美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此外，还涉及拉美殖民地时期的统治制度和人民反抗斗争以及古代印第安文化等问题。

在关于拉美独立战争的论题中，有方回澜的《巴西是怎样赢得独立的》（《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金重远的《海地革命》（《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陆国俊的《论海地革命的特点和性质》（《世界历史》1979年第4期）。这些文章分别论述了巴西和海地独立运动的历史背景、斗争进程和进步意义。特别是对巴西的独立作了新的探讨，提出巴西独立是“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多次武装起义、流血牺牲和长期坚持英勇斗争才取得的”，“同西（班牙）属美洲殖民地取得独立的道路，并

没有本质的不同”等重要论点，这同巴西史学家所谓巴西独立是按照葡萄牙君主的开明意志预谋的结果，苏联史学家强调巴西独立不过是“从葡萄牙分离”出来等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对十九世纪拉美历史发展的探讨，有乔明顺的《略论墨西哥近代史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近代墨西哥的社会性质》（《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和沙丁、杨典求的《试论华雷斯领导的墨西哥革新运动》（《拉丁美洲丛刊》1980年新1期）。这些文章对近代墨西哥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典型分析。乔明顺的文章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渊源和独立以后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论述了近代墨西哥社会的演变过程，提出“近代墨西哥的社会性质，应属半封建半殖民地范畴”，“根深蒂固的封建关系，形式上的独立自主，而实际上却依赖于外国侵略势力，这三种因素的结合，就成为它既区别于殖民地，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志”。沙、杨的文章分析了近代拉美国家自由主义改革斗争的范例——十九世纪中叶墨西哥的革新运动，论述了由华雷斯（胡阿雷斯）领导的改革斗争的进步作用和历史意义，指出以华雷斯为首的自由派人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推进反对封建军阀和教会势力的改革，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民族解放思想指导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从而赋予革新运动以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成为“现代墨西哥和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先驱”。

在研究现代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及其重要思潮方面，黄邦和的《“格瓦拉主义”评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从大陆主义——世界主义、现阶段拉美革命的性质和游击中心论三个方面对格瓦拉主义作了剖析，指出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冒险主义理论，有些主张与托洛茨基主义相近，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危害极大，因此世界上马克思主义者都严厉批判它的错误。霜叶的《庇隆与庇隆主义》（《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探讨了庇隆主义的理论——“正义主义”及其实践，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混合物”，“反映了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庇隆成为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虽然他有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历史污点”。杨典求的《略论现代拉美五次资产阶级革命》（《拉美

史研究通讯》1980年第2期）概括地论述了本世纪以来在拉美三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墨西哥、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古巴和尼加拉瓜先后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其特点，并着重探讨了古巴革命由于苏联的干预而形成的“独特性”，提出现代拉美资产阶级革命正在沿着两种路线发展。一种是西方传统的旧式资产阶级革命，另一种是苏联影响下的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而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拉美尚未出现。叶维钧的《试论“阿连德道路”的经验教训》（《拉美史研究通讯》1980年第2期）和刘文龙的《阿连德政权失败的国内因素》（《拉美史研究通讯》1980年第2期）分析了七十年代初期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反帝民主改革及其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迷信”资产阶级宪法和议会制度，“盲目信赖旧军队和反对人民掌握武装”，以及采取“超阶段”的“过激”经济改革措施，是“智利道路”破产的主要原因。尚文的《现代拉丁美洲天主教会政治作用的变化》（《拉美史研究通讯》，1981年第3期），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天主教会在民族民主运动的冲击下，由封建性教会转化为现代资产阶级教会的主要表现，阐明了教会内部出现激进派教士活动的意义及其政治影响，指出从整体看拉美天主教会的保守性质并未改变。

关于当代拉美国家的社会性质问题，拉丁美洲研究所主办的《拉丁美洲丛刊》开辟专栏展开讨论，先后刊登了十余篇文章，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并评介了国外的有关论点。其中郑挺、尚文的《谈谈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性质》（《拉丁美洲丛刊》1980年第3期）从二次大战后拉美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各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拉美主要国家（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乌拉圭等六国）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表现，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西欧、北美而具有“经济畸形发展、封建残余相当严重、对外依赖性依然保持”的显著特征，并指出“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其他拉美国家“也正在逐步实现这一社会性质的转变”，“只有一些经济特别落后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变动不大”。

在论述拉美与美国的历史关系方面，王春良的

《美俄矛盾与门罗主义》（《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和祝立明的《试论门罗宣言的性质和作用》（《世界历史》1981年第5期）分析了拉美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认为在当时存在沙俄扩张和神圣同盟干涉威胁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美国提出门罗主义是“防卫性”的，“不仅代表和保护了美国的利益，而且在客观上对拉美独立战争和拉美新共和国的诞生，起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因而它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吴机鹏的《美国和古巴独立战争》（《拉美史研究通讯》1980年第1期）和林静芬、白凤兰的《1898年的美西战争》（《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近代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历史画卷，阐述了当时美国利用古巴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乘机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夺取古巴并进而向南美侵略扩张的史实。吴机鹏的文章还着重对古巴民族解放斗争指出了“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历史教训。杨典求等的《美洲国家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通过分析美洲国家组织产生、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对这个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性质与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从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衰落，特别是在拉美国家民族主义潮流的冲击下，这个组织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过去它曾长期是美国控制下的“有效工具”，而现在已演变成为有利于拉美国家“反对美国控制和掠夺”，“同美国分庭抗礼进行对话的重要讲坛”，“在抑制苏联对拉美渗透扩张方面，也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我国和拉丁美洲历史上的友好关系》（《拉丁美洲丛刊》1980年第2期），《中国和墨西哥的首次立约建交及其影响》（《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和《清季巴西遣使来华谈判立约始末》（《拉丁美洲丛刊》1981年第3期）等文章，论述了拉美和中国之间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源流，阐明了华侨特别是华工对拉美经济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探讨了墨西哥、巴西同我国第一次建立外交关系的意义，提出首次建交是双方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从一开始就具有比较友好和平等互利的性质，与当时同西方列强的不平等关系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对促进双方人民友好往来和政治经济联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有利于逐步形成国际交往中和平友好、平等合作的良好传统”。

李春辉的《近代拉丁美洲的华工问题》（《近

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和罗荣渠的《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的华工述略》（《世界历史》1980年第4期）论述了拉美华工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阐明了华工问题对近代拉美与中国关系发展的影响，并指出华工和拉美人民共同反抗殖民压迫与奴役的斗争是“休戚相关”，“紧密结合”的。尚文的《秘鲁华工问题的若干史料简析》（《拉丁美洲丛刊》1981年第4期）评介了在我国历史档案中保存的有关史料及其对研究华工和中秘关系史的价值与意义。张铠的《明清时代中国丝绸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论述了十六至十九世纪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阐明了中国丝绸输入拉美对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和人民友好的积极意义。

在评价拉美的史学发展及其流派方面，有萨那的《拉丁美洲史学思想与史学流派》，陆国俊的《古巴的史学修正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李祥、秦海波的《哥伦比亚史学发展概况》（《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秦海波的《墨西哥史学流派发展概况》（《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期），武汉师范学院巴西史研究室的《关于巴西历史的研究和巴西史学流派》（《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陈海燕的《巴西史学研究初析》（《拉美史研究通讯》1980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分别对拉美各个时期的史学思想及其主要流派——近代的保守派、浪漫派实证派史学和现代的民族民主派、修正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作了介绍与评述。

在评价拉美重要历史人物方面，近几年来主要讨论了博利瓦尔、圣马丁、格瓦拉及哥伦布的评价问题。萨那的《论西蒙·博利瓦尔及其政治思想》（《世界历史》1980年第2期），在认真研究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博利瓦尔是拉美“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拉美共和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奠基者”，他的政治思想是“拉美独立时期最先进的代表”，指出国外史学界有些人出于“偏见”，把博利瓦尔说成是“拿破仑的信徒”、“独裁者”、“个人野心家”，企图“贬低他的历史作用和卓越贡献”。1980年我国首次举行的博利瓦尔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沙丁的发言高度评价博利瓦尔是拉美独立战争中“杰出的民族英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拉丁美洲丛刊》1981年第1期）。王春良的《圣马丁在拉美独立战争中的贡献》（《历史

教学》1980年第1期),论述了圣马丁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突出的可贵处在于他比较重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同时指出了他在政治上“倾向君主立宪政体”的局限性。王杰的《格瓦拉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1期)认为格瓦拉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政治思想“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是,主流是革命,是反映了拉美人民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愿望的”。对哥伦布的评价,有严中平的《殖民主义海盗哥伦布》(《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朱寰的《应该怎样评价哥伦布》、《再论哥伦布的评价问题》(见《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陈根荣的《也谈应该怎样评价哥伦布》(《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等。严中平的文章提出要站在印第安人的立场上“全盘否定、彻底骂倒哥伦布”。朱寰和陈根荣的文章具体分析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及其对拉美进行殖民掠夺活动的历史功过,认为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和进行殖民掠夺,这两个方面集于一身正是显示出“这位早期资产阶级先驱者的形象”。

此外,在其他的专题方面,有乔明顺的《试论西属拉丁美洲的殖民制度与英属北美殖民制度的区别》(《拉美史研究通讯》1981年第3期),和彭家礼的《美洲四百年的奴隶制度》(《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3、4期),分别论述了拉美殖民地统治制度的特点和近代美洲殖民地奴隶制度的兴衰过程。郝名玮的《欧洲移民与阿根廷》(《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分析了阿根廷的移民情况和对阿根廷社会发展的作用。张铠的《图帕克·阿马鲁起义的历史贡献》(《世界历史》1980年第4期)论述了殖民地时期1780年在秘鲁爆发的这次著名起义的斗争过程和重大意义,驳斥了国外史学界有人歪曲历史、攻击和否定这次起义及其领导人的一些谬论。赤林的《美洲印第安人是土生的还是外来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6期)则是探讨古代印第安文化及其人种起源问题的文章。

上述各项专题研究论文的发表,不仅推动了对一些重要课题的研讨与争鸣,而且促进了我国拉美史的研究逐步深入,水平不断提高。

通俗读物与知识普及

我国史学工作者积极开展普及拉美历史文化知

识的工作,组织力量编写拉美史的通俗读物,撰写知识性的普及文章。在六十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及其他丛中,有关拉美史方面的通俗读物有:陈桂荣的《何塞·马蒂》(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金重远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和《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钟华的《海地革命》(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山东师范学院政史系编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中的几个英雄人物》(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拉梅、华健的《墨西哥简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陆丽波的《海地革命的领袖杜桑》(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任雪芳的《印第安人史话》(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等。这些读物深入浅出、具体生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拉美史知识普及工作还得到许多报刊的支持与配合。近几年来,它们经常登载一些传播拉美史知识的简短文章。例如,关于古代印第安文化的有《印第安文化重放异彩》(姜浩银)、《新发现的印第安万年古迹》(守甫)、《不断探索中的玛雅文明之谜》(汤菊明)、《美洲的金字塔》(齐南)、《秘鲁马楚皮克楚古城堡之谜》(金岂)。关于殖民征服的有《印加帝国的覆亡惨痛史》(任雪芳)。关于独立战争的有《“圣母间”的战争》(宗森)。介绍历史人物的有《哥伦布疑案》(霜叶)、《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韦成)、《西蒙·博利瓦尔》(吴永恒)、《弗朗西斯科·德米南达》(焦震衡)、《“墨西哥独立之父”——伊达尔戈》(王春良)、《海地起义领袖克里斯托夫》(蒋明、陆国俊)、《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华雷斯》(尚文)、《“美洲的导师”安德烈斯·贝略》(徐世澄)、《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桑地诺》(侗西)。缅怀中国和拉美友好关系史的有《中墨友谊史话》(肖梓树)等,这些短文大都以简明的叙述和生动的笔触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学术讨论

按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国拉美史的学术讨论活动正在逐步展开。近几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是全国首届拉美史学术讨论会,它是1979年11月底至12初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的组成部分,会上主要讨论了近代拉美独立战争和现代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有关问题,讨论中对

拉美独立战争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是：拉美独立战争是否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是否掌握了独立运动的领导权。认为应当把拉美独立战争放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同西欧、北美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作比较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各自的规律性，才能求得正确的结论。关于领导权掌握在土生白人地主手中，或者是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共同领导，或者象海地是由奴隶领导等各种说法，都需要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研究。对拉美独立战争著名领导人博利瓦尔的评价，看法比较一致，认为1858年马克思在《博利瓦尔—伊—庞特》一文中对博利瓦尔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评价，主要是由于当时缺乏可靠的文献资料所造成的。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根据新提供的可靠史料，对博利瓦尔一生的功过重新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评价。关于现代拉美民族民主运动问题的讨论表明，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基本论点是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是“走不通”的这个著名论断。讨论中认为，历史事实证明上述论断是符合当时世界实际情况的，但几十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述论断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变了。因此我们应当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拉美民族民主运动中出

现的新情况，寻求符合当前实际的新答案。讨论中联系到古巴革命、尼加拉瓜革命和“格瓦拉主义”、“卡斯特罗主义”及“庇隆主义”等问题，提出二次大战后拉美一些国家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实际上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领导的，但是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彻底完成这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更谈不上实现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讨论中还提出对格瓦拉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在充分肯定他是一位反帝的坚强战士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同时，必须严肃批判他宣扬游击中心论、给拉美人民的革命斗争带来很大危害的严重错误，明确划清所谓格瓦拉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战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界限。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会，促进了近两年我国拉美史研究工作的较快发展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学术争鸣。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拉美史部分的编写工作，在主编李春辉的主持下，已确定条目和字数，于1981年9月进入组织撰写阶段，并将《墨西哥历史概述》、《巴拿马运河史》等试写条目初稿印发参考。

我国对拉丁美洲历史的研究已有一个较好的开端，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应当承认，我国的这一学科目前尚处于初建阶段，研究力量比较薄弱，整个工作缺乏计划、协调和系统性，学术著作犹如凤毛麟角，专题研究不够广泛、深入，特别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理论上的建树尤待加强，这些都是需要共同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上接第27页） 1800年到1900年，耕地面积从113,000,000英亩增加到414,810,000英亩，增加3.5倍。1860年到1900年，小麦产量增加3.5倍，玉米增加3倍。^①

应当指出，十九世纪下半期，美国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基本上是在使用畜力的基础上的。七十年代刚开始使用蒸汽拖拉机。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代化的拖拉机和运输工具才得到推广。而农业的全盘机械化大约是在1940年完成的。不过，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来看，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农业已经实现了初步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同当时的资本主义农场的规模和生产状况是相适应的。

总之，“美国式”道路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变革的内容。它开始于独立战争，形成于宅地法的颁布，终结于十九世纪末期。由于南部问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需要进行专题探讨，因此本文没有涉及南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

（本文作者张友伦，1931年生，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① 参阅苏联《近代现代史》，1958年第4期，52页，